

## 试论关于加拿大民族性的文学理论<sup>〔\*〕</sup>

○ 耿力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要反映经济基础的现实。加拿大文学亦不例外,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着加拿大社会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文学批评界对于加拿大文学所描述对象的秉性进行评述,产生了关于加拿大民族性的“要塞心理”(诺思罗普·弗莱)和“生存主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种理论。但是这两种理论似乎与加拿大文学所描述的加拿大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不相符合。澄清这两种理论的构成原因,结合加拿大文学经典作品对其进行对照和审视,并且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对于我们了解加拿大文学,认识加拿大国民的特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性;加拿大文学;文学理论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1.024

加拿大人的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研究加拿大文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针对加拿大开展国别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加拿大是个多民族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英语民族,即自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于1497年为英王亨利七世探险找到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后,年复一年移居加拿大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后不愿与取得胜利的美国人(其中多数其实也是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移居到北美的)共处一国的保皇党人。他们北上移居落脚于加拿大的中部地区(今天的安大略省)和东部

---

作者简介:耿力平(1954—),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加拿大小说、英国18世纪文学、文献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艾丽丝·芒罗研究”(项目批号:14BWW032)的前期成果。

地区(东海岸的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占人口比重第二多的是法语民族,即自法国探险家雅克·卡地埃(Jacques Cartier)在1534至1542年间三渡大西洋为法国发现加拿大后,不断移居到新领地的法裔加拿大人。此外,还有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乌克兰等陆续移居加拿大的人。当然,还有地位特殊的原住民(他们中间又分为不同的族群);2006年加拿大国家统计确认他们目前不到一百万人。再有就是每年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亚洲)移居到加拿大的新居民;加拿大政府网站的最新情况通报说,加拿大在2016年将接受280000至305000新移民。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加拿大的国策把官方语言确定为英语和法语。这就从整体性的角度奠定了整个加拿大民族的文化属性,即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主体。另据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数据,加拿大全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为1885万,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为705万;前者占约63%,后者占约37%。而其他900万左右以非官方语言为母语的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英语作为在社会上沟通和交流的语言。<sup>[1]</sup>由于这种语言比例上的关系,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其中包括华裔、日裔、非洲裔等非主流语种的少数民族作家)远远超过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而英语读者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法语读者的数量。久而久之,英语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力在加拿大取得统治性地位,并开始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艾丽丝·芒罗获得201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四位加拿大作家获得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英国布克小说奖。2016年又有两位加拿大作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有鉴于此,下面的分析与商榷也侧重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

## 一、关于加拿大民族性的文学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文学评论界出现了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关于加拿大文学所反映的加拿大民族性的理论表述。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要塞心理”(garrison mentality)的概念。契机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卡尔·弗·克林克教授组稿并于1965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文学史》。克林克教授是这部重要著作的主编,他在几年前就召集加拿大文学批评界的精英,酝酿出版一部总结加拿大文学的大作,并把为这部史书撰写最后的“结论”之任务交给了弗莱。在这篇全面分析总结加拿大文学发展史的“结论”中,弗莱着重分析了加拿大民族的心理活动:

孤零零地散布在荒原的小小社区,被客观的和心理的“边疆”所围困,不仅彼此远隔,而且脱离了社区成员之前所熟悉的英美文化的源流。这些社区为其成员设定所有的明确的人生价值标准,而居民们不得不充分尊重这些赖以生存的法律和秩序,团结在一起应对居民点外面无垠的、无意识的、充满威胁且难以应对的恶劣的客观环境。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社区居

民必定会产生我们权且称之为“要塞心理”的思想。<sup>[2]</sup>

弗莱接着进一步阐述他所谓的“要塞心理”的构成：

要塞区是个组织结构松散并且遭受围困的小社会，其所认同的社会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在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中，不存在讨论理由或者动机的条件和环境。社区里面的居民不是斗士便是逃兵。这里，我们又可以求教于普拉特，他绝对可靠的本能使得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加拿大文学想象的内质。普拉特诗歌中的人们总是由充满紧张情绪的一群人构成，他们或者在进行战争或者在执行救援或者在进行圣战或者处于危机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道德观仅仅是这群人所认可的。<sup>[3]</sup>

依照他所观察到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环境，弗莱得出了以下结论：

增建要塞区是很容易的，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种反文化的情绪开始进入到加拿大人的生活。这种社区内产生一种占据压倒地位的羊群效应，而在这种从众心理统治的环境中，任何独创性的思维都变得不可能。<sup>[4]</sup>

弗莱对于早期加拿大文学风貌的描述符合许多作品的表象，但是并不适用所有的作品。他针对加拿大人心理特质的判断，说他们在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时，总体表现得消极、恐惧、麻木和缺乏创造性，是很值得商榷的。弗莱不断引述一些加拿大文学作品来证明他的观点。比如，他对一位著名的 19 世纪加拿大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做了如下评论：

当年苏珊娜·穆迪身陷彼得伯勒（笔者注：这个地方 19 世纪中叶时仍是荒原，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中等城市）的丛林中，被一帮滑稽而危险的被她冷漠地视为美国佬、爱尔兰人、当地土人、共和党人以及下等人的乌合之众所围困，其实就代表了英国占领军要塞，她就是一个人的要塞。<sup>[5]</sup>

当加拿大进入 20 世纪之后，即便弗莱也承认“加拿大社会已经牢牢掌控了自然环境”，即便弗莱自己也认为“在道德标准和生活态度方面，个人越来越容易独立于团队而持有不同的看法”，<sup>[6]</sup>但这位批评家对于加拿大文学的整体看法仍然是悲观的。作为支撑他的观点的证据，他提到加拿大东海岸作家欧内斯特·巴克勒（Ernest Buckler）的小说《山与谷》（1952），认为它代表大西洋沿岸各省心理状态的主流声音。他还提到加拿大中部作家辛克莱·罗斯的小说《至于我和我的屋》（1941），认为它代表加拿大中部地区几个农业省的主流心声。他认为在这两部小说中，叙述人所讲的故事都是偏阴暗和悲观的，同其背后作者思想和情绪相符合。弗莱对此的解释是：“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情绪只能说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sup>[7]</sup>

至此，让我们归纳一下弗莱关于加拿大民族特质的基本观点：早期欧洲裔的加拿大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不得不居住在各个要塞中。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即恶劣的环境，他们采取了抱团取暖的策略，并且遵循着统一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由此，他们产生了“要塞心理”。时光逝去，到了 20 世纪，加拿大人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不再受制于外在的因素。但是，却开始

出现个人异化于社会的现象,作家们的文学表述依然偏阴暗、偏消极。

弗莱关于加拿大民族性及其文学表述的评价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产生重要影响。一些信仰并追随“要塞心理”的批评家对这个理论加以阐述甚至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加拿大著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值得一提的是,弗莱本科毕业于在1890年与多伦多大学组成联合体的维多利亚大学下属的维多利亚学院,到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在维多利亚学院任英语教授直到退休。而阿特伍德亦毕业于维多利亚学院,本科主修专业是英语。

在弗莱的“要塞心理”理论的基础上,阿特伍德派生出所谓的“生存主题”(Survival Thesis)理论,并以此来诠释加拿大的民族性。阿特伍德在其1972年出版的《生存——加拿大文学导论》一书中提出她对于加拿大文学作品(包括英语和法语)的主题分析,发出了颇有影响的“求生与受害”的论断,她说:

每个国家或文化的核心都有一个独特的富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象征……加拿大最主要的象征毫无疑问的是生存——这是根据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文学中的大量例子得出的结论……我们的故事往往不是宣扬人们如何在经历磨难后,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是诉说人们如何死里逃生,侥幸活了下来。<sup>[8]</sup>

按照阿特伍德的推导,与“生存”概念紧密相关的是“受害”(Victim)理念;在论述这个理念时,阿特伍德自问自答道:

加拿大人甘于认输的心理准备,是否同美国人决心获胜的意念同样强烈、同样令人折服?……假如可以在象征物所代表的正反两重性之间做出选择——大海可以是给予生命的母亲,也可以是沉船害命的祸首;大树可以代表成长,也会砸到你的头上——加拿大人十有八九会认同消极的负面。<sup>[9]</sup>

阿特伍德认为整个加拿大是个受害群体,而这个群体受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源自四种适用于国家、少数民族及个人的“受害表现”(“Victim Positions”)。比如“第一受害表现”就是“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sup>[10]</sup>

阿特伍德的所谓“生存主题”是从弗莱的“要塞心理”演绎而来。这两种理论均渗透着一种民族悲哀感,一种消极和被动的思维机制,仿佛加拿大的民族性是以宿命论为核心的。弗莱与阿特伍德的观点在加拿大文学批评领域一直作为主流评价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现在)被看作是加拿大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很少有文学批评家对这两种理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提出过质疑。

## 二、对加拿大民族性文学理论的质疑

众所周知,理论来自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既然弗莱对于“要塞心理”的阐述和阿特伍德对于“求生主题”的论断是基于加拿大1867年建国之前以及建国之后的文学表述,既然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民族性就是基于这些

历史证据,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加拿大文学的历史实践与两位批评家的民族性理论加以对照,以便验证其理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笔者研读了弗莱和阿特伍德所引用的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数百个不同范畴的、写于不同时期的、具有不同地区代表性的加拿大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却并未找到弗莱所宣称的“要塞心理”的文学根据,也没有看到阿特伍德所坚称的“生存主题”。民众的所谓从众行为或者消极心态并不是主流加拿大作家所唯一或者集中表现的。阿特伍德所归纳总结出的关于加拿大民族之被动、沉沦、仅求生存的特性难以在具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作品中寻觅到。在下面有限的篇幅内,我们回顾一下两位批评家提到的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作家和作品,试看能否得出他们所一致认同的所谓加拿大的民族特性。

弗莱在谈到加拿大文学所传递的民族性时,提到加拿大早期小说家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及其成名作《丛林中的历练》*Roughing It in the Bush*,并以此为例说明他的“要塞理论”。这部早期小说发表于1852年,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穆迪是来自英格兰的中产阶级移民,她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自己的开拓小说。这部介绍加拿大移民生活的小说对于考虑移居加拿大的英国读者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在这本书的“介绍”中,作者一分为二地全面介绍了自己亲历的生活。穆迪既提到了在加拿大这个陌生世界重新开启生活的巨大挑战,如新移民面临缺少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如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常常被贪婪的土地中间商欺骗。但是,作者也着重提到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实现创业致富愿景的巨大可能性。她列出许多在母国享受不到的好处:“这里的气候有益于健康,这里的土地肥沃,这里的水资源极其丰富,这里离英国不远。最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不必交税”。<sup>[11]</sup>在“介绍”的结尾,作者坚定地对读者宣告:“掌管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伟大上帝了解我们从小在劳动中锻炼出的强壮臂膀,了解我们在艰苦忍耐中、在极端天气中、在粗茶淡饭中、在简陋的住所中磨练出的钢铁般的毅力。他把我们这种人派到丛林中,披荆斩棘开出通往文明的大道。这批人变得富有发达,成为一个伟大的蓬勃向上的国度的骨干力量”。<sup>[12]</sup>穆迪强调说,“新移民的辛劳所得到的结果不是累倒趴下,而是创造出财富;劳动带来自由和满足,而不是乡恋和绝望”。<sup>[13]</sup>从全书的整体叙事效果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积极向上的。在讲述具体的生活经历时,作者既谈到吃苦与受难,也谈到收获与成功,实在是一部务实的开拓记录。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充分感受到开拓者们的乐观情绪和创造能力。比如,穆迪善意地同住地附近的原住民搞好关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如何识别草药和如何制定土方,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如何“靠山吃山”。她充满自豪地谈到,自己曾经因地制宜用满地生长的蒲公英的根茎做出味道接近咖啡的原料,共全家泡水饮用。她甚至告诉读者:“这种咖啡证明很不错,甚至比在商店买的都要好许多”。<sup>[14]</sup>

当这部纪实小说于1871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再版时,穆迪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强调什么样的人适合到加拿大闯生活:“那些满足于靠出身这种偶然因

素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和勤劳获得并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会沮丧地发现自己在这个国度中不被人认可,因为加拿大所奖掖的是能干的劳动者,而任由那些懒惰、游手好闲的混混儿在贫困潦倒中默默无闻地消亡”。<sup>[15]</sup>显然,穆迪眼中的早期英国移民是一群不畏艰苦、勇于探索的民众。他们绝不是仅仅设法生存,而是要创造比在母国好得多的新生活。他们在面对巨大的生活挑战时,满怀着坚定的信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丝毫没有想到在要塞中封闭自己,丝毫没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在加拿大这片对所有新人都一视同仁的土地上,每个人都要抛弃旧世界固有的重出身、重地位的保守观念,每个人都要放下身段投入劳动。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内容来看,这部作品完全不适合弗莱所贴的“要塞心理”的标签。相反,它是一部歌颂开拓者精神的作品,赞美劳动者的吃苦耐劳、勇敢智慧和快乐幽默。不论出身、奖勤罚懒、自由奋进、和睦团结,这些其实就是 19 世纪移居加拿大的绝大多数欧洲移民的主体价值观,也正是构成加拿大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

埃·约·普拉特(E. J. Pratt)是加拿大 20 世纪诗歌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来自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当时尚未加入加拿大),也是在上面提到的维多利亚大学下属维多利亚学院读完本科,后来又在维多利亚大学下属伊曼纽尔学院取得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弗莱非常欣赏同事普拉特的诗歌,并在谈论贯穿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消极被动的情绪时,多次引用普拉特以泰坦尼克号失事为素材创作并于 1935 年发表的叙事诗《泰坦尼克号》。弗莱认为这首诗证明加拿大文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宿命心理。弗莱带着“要塞心理”的先见之明来读普拉特的诗,认为是一首描绘人们悲观和宿命的写实作品,是崇拜科技的人们遭受自然界当头棒喝的又一案例。诚然,普拉特的长篇叙事诗生动地再现了泰坦尼克号所遭遇的悲剧。但是长达 1032 行的叙事诗不仅回顾了泰坦尼克号巨轮的诞生和死亡,不仅描写了大自然与现代科技的矛盾,而且记录了人们在接受生死考验时的不同表现。在这场人生的考验中,读者既可以看到可憎可唾的卑鄙自私小人,更可以发现可歌可泣的百姓英雄和践行传统骑士精神的绅士。在巨轮撞上冰山开始下沉后,船底轮机舱的水手们冒着被淹死的危险,坚守岗位直到冰水吞噬他们:“冰水漫到膝盖,冰水淹到腰际,他们依然守在岗位,再没人在甲板上看到他们的身影”。<sup>[16]</sup>按照船长的命令,妇女和儿童优先进入数量有限的救生艇。当第 14 号救生艇就要被启动降到海面时,上面还有几个空位。这时,船长允许少量男士登艇随优先上艇的妇幼一起逃生。但之后,当这艘救生艇被降至海面时,突然出现一群从下等舱挣扎着跑上来的女人。在这生死关头,那些马上就要死里逃生的男士们,表现出骑士精神,做了绅士应该做的事:“没有命令/从军官的口中喊出/没有一声抱怨,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救生艇被拽了上来,艇内的男士们迈步而出”。<sup>[17]</sup>普拉特的诗还特地描写了一位同那些男士一样富于牺牲精神的坚贞女士。她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亲自给贴身侍女穿上,并护送她登上救生艇。这位贵妇无视船长要她登艇逃生的命令,平静地走回到

夫君的身旁,神色坦然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四十年了,你去哪儿,我就随你到哪儿”。<sup>[18]</sup>

普拉特对人类悲剧入木三分地剖析,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当泰坦尼克号上的海员和乘客直面生存与死亡的挑战时,他们赤裸裸的人性被普拉特客观地记录下来,其中既有黑暗的一面,更有闪光的一面。这就是普拉特诗歌的风格。他的诗仅仅客观地描写事实,而让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含义。他的诗富于戏剧性,常给人紧张感,但它绝不虚伪地煽情,而是把悲壮渗透于字里行间之中。正如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约翰·罗斯所指出的,“大自然一直是广泛存在于加拿大民众的主要生活体验中,并且是一个有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不能据此得出文学评论界中某个流行传说,即自然界是在有知觉的宇宙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是在有意而为,是在用它的深不可测的意向左右着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sup>[19]</sup>换言之,罗斯教授的观点就是事在人为,就是说人类并不受大自然的控制,而一味强调人类命运依附于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就没有根据。

休·麦克里南(Hugh MacLennan)是弗莱和阿特伍德都推崇的加拿大小说家,他在1941年发表了处女作《气压计上升》*Barometer Rising*(注意:不是《气压计下降》)。该作品讲述了居住在加拿大东海岸城市哈利法克斯的一对年轻恋人面对情感考验的故事。故事的时代背景是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发生的季节是寒冷的冬天,而惨烈的哈利法克斯港军火船大爆炸事件又贯穿其中。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不光彩地“死”在欧洲战场,身背着临阵脱逃的污名。尽管如此,女主人公依然思恋如旧,尽管她这样做得不到父亲的同情。之后,男主人公活着返回家乡,洗刷了自己蒙受的清白之冤。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似乎也可以用阿特伍德的“生存—受害”论来解释,但是故事的深层却充满了真情。正是这种人间真情最终让事实战胜了流言,让希望战胜了失望,使两位经受了身体和心灵双重伤害的坚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像书名所暗示的那样,经过心灵和肉体历练的这对年青人没有走向颓废,而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周边的不利环境,升华了积极的人生观,开启了有意义的新生活。<sup>[20]</sup>

事实上,阿特伍德所选择的用于证明其“生存主题”理论的加拿大作品,都不会让不带阅读偏见的读者得出她所要做出的结论。阿特伍德在《生存》一书中,以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The Stone Angel*为例,试图说明加拿大文学作品总是描写人物如何想方设法活下去但又不能遂心所愿。她曲解劳伦斯的成名之作,把这部小说的内容归纳为:“在《石头天使》中:有个老太太艰苦挣扎、苟延残喘,最后还是死了”。<sup>[21]</sup>不错,小说的女主人公希普利老太最终是死了,可那只是在肉体层面上,也符合自然归律,因为这位老人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经90岁了。希普利老太一生倔强(有时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哪怕是(也可能正因为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医院的病房里,当她看到同室的小病友16岁的华裔姑娘因为着急上厕所,可按铃又没有护士来帮忙,又急又窘得啜泣时,她不顾自己孱弱的病体,无视

护士的指令,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到洗手间取来尿盆,帮助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地行走的病友小解。这分明是在做好事,在努力助人为乐,与阿特伍德所称的“苟延残喘”大相径庭。事实上,小说的结尾艺术性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希普利老太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之后,觉得总体上活得开心,活得值,怀着满足的心情走了。

劳伦斯的挚友,同为小说家的阿黛尔·怀斯曼(Adele Wiseman),在这部小说的后序中精辟地分析了希普利老太的心理特质:“这是一个类似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只不过其中没有这个希腊人物。从故事的开始到故事的结束,老妇人在絮絮叨叨中重新发现了自己。通过给自己的功过‘盖棺定论’,她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去世之前,她终于百分之百地活了起来”。<sup>[22]</sup>劳伦斯的小小说分明是在讲述人在“生”“死”攸关时刻,如何积极对待,如何传递正能量。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与阿特伍德试图证明的消极“受害”大相径庭,也不符合弗莱所说的“要塞心理”及其变异表现。阿特伍德在《生存》一书中放言:“如果用针随机地对加拿大文学进行穿刺,十有九次你会扎中一个受害者”。<sup>[23]</sup>可是,她并非随机选择的“受害者”范例却并不支持她的理论。希普利老太明显是个被阿特伍德圈定的“被受害者”,是个被执意放入主观设定的理论框架中的文学牺牲品。

在笔者看来,“生存”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为了活命而努力;其二是努力克服困难,在逆境中闯出一条生路,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活下来是为了获取更高的人生目标。在后一重意义上,一个人即便经过奋斗未能成功,未能存活,其精神也是可贵的,其心理也是满足的。即便是死,也会平静地、从容不迫地离去。也就是说,“生存”在文学作品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弗莱和阿特伍德似乎把手段与目的颠倒了。加拿大文学并非把加拿大民族描述成一个仅仅希望活命和生存的懦弱群体,执意做这种解释实在是严重的不公和误导。

加拿大民众在面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甚至是危险的时候,表现出的基本内在气质不是绝望或者放弃。他们有时会选择忍耐,但绝不是被动地、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一生。辛克莱·罗斯的成名作是1941年发表的《至于我和我的房子》*As for Me and My House*。这部小说描写大萧条时期加拿大中部农业省一个小镇的生活。许多批评家(包括弗莱和阿特伍德)把这部书信体小说看作是小人物在苦难而单调的生活中所表现的无奈与绝望的生存记录。但是在笔者看来,小说的男主人公,一位为了挣得一份微薄的薪水而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了乡镇牧师艺术男,尽管生活清苦,尽管忍受着宗教信条的约束,尽管精明而掌控欲强烈的妻子与他貌合神离(夫妇俩没有生育后代;两人分别各有所爱),但是他仍然暗中维持着自己对艺术和浪漫的追求。他利用经书的背面练习素描,他与年轻女子Judith产生爱情并且悄悄地发展这份虽然违背公德但却是真实的男女关系(小说结尾时生了一个儿子)。善于察言观色,揣测丈夫心理变化的本特利太太也不得不承认与她视如陌路的丈夫“一直在生活着,成长着、变化着、



成熟着”。<sup>[24]</sup>

事实上,加拿大民族不断思考、不断进取的特性是一贯的,而这种向上的精神贯穿于具体的生活当中。在加拿大当代著名小说家艾丽丝·芒罗(201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如何新的社会环境中践行加拿大民族的优良传统。芒罗的成名小说《少女和妇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这部发表在 1971 年的小说讲述女主人公黛儿的成长历程。

表面上看,黛儿似乎是一名男权压制下的受害者。在她从少女长成为成年妇女的过程中,有三个与她过从密切的男人分别对她进行过猥亵、玩弄甚至伤害。但是从心理层面来看,女主人公并不完全是一个受害者。黛儿从未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牺牲品。她容忍老男人张伯伦对她的不轨行为,因为自己当时正处于生理发育期,对异性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好奇。她同意让男同学斯托里看自己的裸体,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胴体显露着青春的活力。她坠入情网并在高考前与男友缠绵纵欲,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虽然母亲常常警示黛儿不要走她的老路,时时督促她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逃离落后保守的农村,但是黛儿却不以为然。她并不把考上好大学作为人生的惟一目标。她更看重自己的情感和兴趣,她更想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外在的需求或者别人的看法而活。在男权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的上世纪 70 年代,芒罗就已提出她独特的、不同于常态的女性主义新思维。女性为自己权益的奋争不仅仅体现在政治要求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当男友弗伦奇强迫她入教并接受浸礼时,黛儿把恋情放在一边,坚持不信教,不进行浸礼。当他们二人在村边的河中一边戏水一边争论时,男友突然将黛儿的头强行按入水中,实施所谓的“浸礼”。而黛儿则出于“本能地拼力反抗”,坚决地进行“自我拯救”。<sup>[25]</sup>她用双脚猛地蹬开侵害她的男人,得以逃生。这里的“逃生”具有双层意义。黛儿的思维是:“竟然有人错误地认为可以真正地掌控我”。<sup>[26]</sup>这种思维说明黛儿对自己的自由身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爱情和人生方面的感悟使黛儿对自身和社会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对自己的抉择更加有信心且更加坚定。

最后,笔者想举一个弗莱和阿特伍德都没有提到的加拿大文学例子,就是加拿大建国前一位叫做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人创作的一首小有名气的叙事诗《新兴的村庄》(1825)。这首诗之所以有名(至今仍出现在加拿大诗歌选集中),原因在于它呼应英国 18 世纪的一首诗歌《被遗弃的村庄》,不仅与之形成对比,而且两首诗的作者沾亲带故,都叫戈德史密斯,而英国的作者是加拿大作者的祖伯父。祖伯父在 1770 年发表的《被遗弃的村庄》中,谴责英国圈地运动造成的村民流离失所,留恋从前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侄孙移民到加拿大东海岸定居后,垦荒发展、兴家立业,在成功之余用相同的诗格(押韵的五音部抑扬格双行诗)和了一首。祖伯父戈德史密斯通过对比手法,把奥本村

从前的田园般的幸福生活同圈地运动后被迫离家出走的悲惨生活加以对比,揭露了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残酷。大量走投无路的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甚至飘洋过海,到新大陆另谋生计:“悲伤的村民,走下岸堤,迈向大海, / 黑压压一片,覆盖了沙滩和海滨”。<sup>[27]</sup>与此悲凉情景形成对照的是侄孙戈德史密斯在加拿大东海岸作的应和诗《新兴的村庄》。这首诗热情地描述了新移民建立社区,喜获丰收,憧憬未来的心境:“多么令人欣慰,多么令人兴奋, / 你们怀揣心中的希望,那种光明暖人的希望! / 这希望就在我们眼前,是那么的令人喜悦 / 是对未来一年又一年美好日子的希望!”<sup>[28]</sup>不言而喻,虽然这两首诗的格律相同,但是后者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它描绘的社区民众是富足的。昔日的忧伤和痛苦在加拿大新移民的记忆中消失,和谐的生活和丰收的喜庆跃然纸上。在这首加拿大诗歌中,既没有弗莱的“要塞心理”,也没有阿特伍德的“侥幸存活”,有的倒是加拿大一直保有的坚韧、勤劳和乐观。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用“要塞心理”和“求生主题”来归纳和总结描述加拿大民族性的加拿大文学作品,是不准确、不客观的,也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或者主观的。此时,笔者想到弗莱在《靠谱的印象》(*The Educated Imagination*)一书中曾说过,“文学世界中没有现实,仅有想象”(“The world of literature is a world where there is no reality except that of the imagination.”)<sup>[29]</sup>这句话的表意不难理解,但是结合弗莱所坚持的有关加拿大民族性的论断,我们似乎感到其中的极端性,甚至嗅到其中的反讽味道。如果把批评家个人的主观臆想强加于现实世界,那么文学中就真的没有现实的存在。这里有必要重复本文“摘要”中的第一句话,“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要反映经济基础的现实”。加拿大文学所反映的是加拿大社会,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民众,是这些民众在生存、生长和建设表现出的气质或曰加拿大民族性。从整体上看,加拿大的绝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加拿大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就是靠这些辛勤付出的加拿大人(广义上的)才取得的。

马修·阿诺德在1865年发表的《论文学批评》中强调文学批评的首个标准就是批评家的“非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即“保持大脑的自由度……配以绝对的诚实和相应的能力”。<sup>[30]</sup>汤·斯·艾略特在他1920年发表的文学批评文集《圣木》中完全认同阿诺德关于要客观评价文学作品的观点(见“完美的批评家”/*The Perfect Critic*一文)。在两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学批评的功能》论文中,艾略特再次强调:“文学评论家……应该尽量约束自己的偏见或脾气(尽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些缺点),与尽可能多的同行进行切磋和研讨,以便在共同追求符合实际的评价的过程中,不断缩小我们之间不同观点的对立程度”。<sup>[31]</sup>由此看来,弗莱和阿特伍德从理论高度所归纳的有关加拿大民族性的文学表述渗透着他们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对喜爱加拿大文学的读者或者研

究加拿大文学的学者的错误指导。反之,如果我们持开放的态度去欣赏众多不同范畴和不同时期的加拿大优秀作品,就可以对加拿大充满活力且与时俱进的文学传统(尽管时间不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比较真实的感悟。结合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史来解析和评价加拿大文学中的瑰宝,我们就更能够体知其中蕴含的正能量,而这种正能量恐怕才是加拿大民族特性的精髓。

### 注释:

- [1]加拿大统计局 2006 年数据: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as-sa/97-555/p1-eng.cfm>.
- [2][3][4][5][6][7]Northrop Frye, "The Conclusion" to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Gen. ed. Carl F. Klinck,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pp. 342, 342-43, 343, 351, 351, 351, 351.
- [8][9][10][21][23]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Anansi, 1972, pp. 31, 32, 33; 35, 36, 34-5, 39.
- [11][12][13][14][15]Susanne Moody,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1852,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9, pp. 12, 15, 15, 354, 531.
- [16][17][18]E. J. Pratt, *The Titanic in E. J. Pratt: Selected Poems*, ed. Sandra Djwa et a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p. 74, 77, 77.
- [19]John Moss, *Patterns of Isolation*.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4, p. 111.
- [20]Hugh MacLennan, *Barometer Rising*. 1941.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91.
- [22]Adele Wiseman, "Afterword" in *The Stone Angel*, 1964,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68, p. 310.
- [24]Sinclair Ross, *As for Me and My House*. Afterword by Robert Kroetsch. 1941.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9, p. 177.
- [25][26]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1971, Toronto: Penguin, 1990, pp. 197, 198, 197.
- [27]Oliver Goldsmith, *The Deserted Village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 M. H. Abrams et al., 11th ed., Vol. 1, New York: Norton, 2000, p. 2481.
- [28]Oliver Goldsmith, *The Rising Village in Literature in Canada*, ed. Douglas Daymond and Leslie Monkman, Vol. 1, Toronto: Gage, 1978, p. 111.
- [29]Northrop Frye, *The Educated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96.
- [30]Ma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1864,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British Literature*, ed. David Damrosch, Vol. 2, New York: Longman, 1998, p. 1663.
- [31]T. S. Eliot,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 Ed. David Lodge. London: Longman, 1972, p. 78.

[责任编辑:李本红]